

“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论坛综述

——纪念张栻诞辰 880 周年

刘 焦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6)

在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张栻(1133-1180)诞辰 880 周年之际,由中华朱子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香港孔教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论坛于 2013 年 10 月 19-20 日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 110 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张栻研究及其现代价值和意义这一主题,对张栻在中国哲学史、经学史、教育史、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张栻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等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 关于张栻的心性论

张栻与朱熹齐名,在心性论上提出性本论和“心主性情”等思想,对整个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张立文教授认为,作为事事物物所以生生的太极和理,流行到事事物物,物物有一太极,万理在万事,流行到人便是人性,在事物便是物性。张栻人性的核心内涵是仁义,仁义之性的本质内容是万善之宗,就是人性是善的。成中英教授认为,张栻基于朱熹的中和之悟得到“心统性情”或“心主性情”的认识,因之显示心之为心的主体能动性,却未能表达心之为能动主体与性之兼为主客体之间的有关重要功能与关系,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这些功能可能没有感觉,或不能认识。杨柱才教授从《太极图说解》来说明张栻的太极本性,认为:张栻的心性论与太极密切相关,太极本体(也即性之本体)的动静,可以从喜怒哀乐、未发已发的角度来理解;张栻所谓太极之体与太极之性,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向世陵教授从张栻“性善论”角度出发,认为:“善”不仅可

以赞叹先天本性的美好,也可以确指后天真实的德性,这就是仁义;仁义依存于性,是一切善德的源头,而仁义的发现就是善的行为,由于太极化生带来的动能,内在的仁义可以自然地扩充展开;张栻性善的普遍,必然是建立在性的普遍必然基础上的,以性为本的理论,从存在的架构说,基本点就是性物一体、道器不离。刘兴淑副研究员认为,张栻将孟子的性善论扩展,一方面人与万物有一共同本原,另一方面这一本原是善的,是包括人性和物性的性,可名之为天地之性,因此,性善不仅仅归为人之善,还有物之善。张琴讲师认为,张栻批判地发展了胡宏“性一分殊”与“性体心用”思想,建构了以性为本位、分别以太极与心为核心的宇宙论与心性论体系。

二 关于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

蔡方鹿教授认为,张栻思想有求实、求理的内涵,张栻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实事求是、客观地对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加以适当的肯定,在循理的前提下,对于铁钱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一一务之,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涵是重躬行践履,同时把训解文字与阐发义理相结合;他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提倡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注重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李振纲教授和邢靖懿讲师从内圣外王角度认为,张栻将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相结合,主张为学、为政都须务实,讲经世、重功利,但并

不象浙东学者那样认为心之本在于功利,而是将内圣外王之德、心性修养置于更根本的地位,经世致用本儒学道术,以明道救世为目标,是儒家内圣的实践与推衍,是实现外王的途径与手段。张利明助理研究员从张栻《孟子讲义序》中的“无所为”与“有所为”来说明张栻的义利观,认为“无所为”与“有所为”是张栻义利之分的标杆。赵淼博士从“经世”二字的考据,分析张栻对“经世”的理解,从而得出张栻经世活动的理论来源。

三 关于张栻与同时代学者的关系

张栻作为宋代理学大家,在与同时期学者的交游、交流中,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张栻思想也得到了提升。

张立文教授认为,张栻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特别以张栻和朱熹的中和之辩为重要,张栻在中和之辩中坚持“先察识而后存养”的心性修养工夫,而不取道南学派从主静中体验未发的寂然不动气象,以中体和用的分析范式,体认已发流行过程中主一居敬之功。陈代湘教授分析比较了张栻和朱熹思想的异同,认为在心性善恶、心性关系、察识涵养等六个方面,张栻和朱熹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太极即性和太极即理上,张栻坚持胡宏性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并加以发展,提出太极即性,朱熹继承和发展二程“理”学,同时吸收周敦颐“太极”理论,提出太极即理,与张栻观点不同;关于心的主宰性,张栻与朱熹看法不同,朱熹关于心的主宰性一般只限于性、情,故而着重阐发“心统性情”之说,张栻虽也提出与“心统性情”意思相类的“心主性情”,但却把心的主宰性放大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陈良中副教授从朱熹对张栻《癸巳论语解》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来认识张栻与朱熹的思想论争,指出朱熹对张栻解经用语、语言逻辑、字词训诂及义理提出了批评,对比剖析张栻《论语解》定稿与朱熹对此书初稿的批评,张栻定稿或据朱子说改、或不改,可见两人解经方法、旨趣和思想的异同,张栻解经不重训诂,疏解语言多带有讲章的率意,而朱子则更加谨严。

郭齐研究员认为,张栻虽然从胡宏问学时间不长,但所受影响不小,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张栻对胡宏的性本体论基本认同,对其中的理论缺陷,张栻采取了改良而不是摈弃的方法;其次,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在张栻看来,胡宏源出洛学,在大本大原问题上不应有原则的差异,因此通过太极形性之说使胡宏的观点向二程靠拢;最后,对胡宏性本体论存在的问题,张栻主要是不满足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

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称本体为性也有有静无动、有体无用之嫌,须加完善。邹锦良讲师从张栻与周必大的知行之辩来看张栻思想,认为:张栻秉承的是理学先师的知行观,而周必大并不赞同“知先行后”的观点,尤其是不同意道学家所提出的“知则无不能行”以及“未有不知而能行者”的论断,但是从周必大和张栻在“知行”问题的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南宋政坛士人与理学士人的交往是相互尊重对方,周必大和张栻两人由“知行”问题引发的辩论实际上是周必大代表的北宋旧儒学与张栻代表的南宋新理学之间的歧异。金生杨教授认为,张栻承教张浚之日长,从学胡宏之日短,继承并改造了张浚的静虚心悟之说,主张觉心性,以心悟《易》,弘扬张浚的体用之说,留心经济之学,发扬程颐居敬主一之论,在继承父祖是非众说思想的基础上,融会众说,各是其是,屏弃异端,归宗洛学,使其学术日渐精醇。胡杰认为,张栻的经学观,尤其是张栻易学,是基于其父张浚易学以象数为本,同时又重视对义理的阐发,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从中阐发性理之学。但是张栻又有新的发展,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一方面重视义理,另一方面不拘泥于象数,更重要的是在张浚为人忠孝廉洁、人品正直的影响下,张栻修仁义之实,承圣贤之学,续圣人之道,拥爱民之心,定收复之志,最终锻就了其一代“醇儒”的为人品行以及为官道德的操守。

四 关于张栻思想的现代意义

张劲松先生指出,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其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有所启示,值得借鉴;提出我们现代人应当从张栻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思想、人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四个方面学习和弘扬张栻的思想,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蔡方鹿教授认为,张栻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对于当前我国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张利明助理研究员认为,张栻“无所为”和“有所为”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有文化领域的发展与作为都具有一定的启发,能够启发我们在这些领域如何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义利观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